

国家社科重点项目“中国历代登科总录”和国家社科青年
项目“社会公益视野下的清代科举宾兴研究”阶段成果



清代江西进士丛考

QINGDAI JIANGXI JINSHI CONGKAO

毛晓阳/著



江西高校出版社

清代江西进士丛考

毛晓阳 / 著

 江西高校出版社

图书在版编目 (CIP) 数据

清代江西进士丛考 / 毛晓阳著. —南昌 : 江西高校出版社, 2014.5

ISBN 978-7-5493-2535-1

I. ①清… II. ①毛… III. ①进士—研究—江西省—清代 IV. ①D691.3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2014)第 106082 号

清代江西进士丛考
毛晓阳 著

责任编辑
文字编辑
出版流程
装帧设计
排版制作
出版发行
社 址
邮政编码
总编室电话
编辑部电话
发行部电话
网 址
印 刷
经 销
开 本
印 张
字 数
版 次
书 号
定 价



邓娟娟
江西高校出版社
江西省南昌市洪都北大道 96 号
330046
(0791)88504319
(0791)88523090
(0791)88517295
www.juacp.com
南昌市红星印刷有限公司
全国新华书店
700mm × 1000mm 1/16
38
530 千
2014 年 5 月第 1 版第 1 次印刷
ISBN 978-7-5493-2535-1
78.00 元

赣版权登字-07-2014-236

版权所有 侵权必究

序

我是台湾省台南县人,长期在福建工作,但对于江西籍学者却有一种特别的情感。1903年,我的曾祖父汪春源补殿试成进士后被派任江西,先是担任了光绪二十九年癸卯科江西乡试的同考官,继而先后任职为江西省宜春、建昌(今永修)、安义和安仁等县知县。与另一位台湾进士澎湖人蔡廷兰一样,曾祖父一生全部的仕宦生涯都是在江西度过的。任职期间,他修考棚、明冤狱、兴新学、审教案,政声著于乡里,上司大计卓异。直至1911年辛亥革命爆发,曾祖父才弃官归田,终其身以教书为业。每次我来到江西,行走在这片红土地上,都仿佛看到曾祖父当年奔波路途不辞劳瘁为民请命的身影。

曾祖父是台湾最后一位进士,我与晓阳也是因台湾进士而结缘。10年前,我在《东南学术》2003年第3期发表了一篇《地域历史人群研究:台湾进士》的文章,从地域历史人群的角度对清代台湾进士的科名佳话、爱国义举和趣闻轶事等进行钩沉索隐取证考据,并列出了一份包括32名台湾进士的名录。两年后,我在《台湾研究》2005年第3期读到了一篇题为《清代台湾进士增补考》的文章,作者对我所主张的台湾清代共有32名进士的观点提出了商榷,认为加上光绪三年台湾县进士黄裳华,台湾进士应该是33名。文章虽然只比我考订的结果多出了1名进士,但我当时却是极为欣喜。因为在我之前,台湾成功大学的黄典权教授已经对台湾进士人数进行了考订、统计,结果是31名,而我的研究是建立在黄文的基础上,比他多考订出了1名进士。现在,台湾进士的人数又增加了1名,而且论据确凿可信。一个相同的研究选题经过多人的辛勤耕耘而能不断有新的发现,身处其中的人自然会为之欢喜,为之欣慰。

通过这篇文章我认识了晓阳,并进一步阅读了他在浙江大学师从龚延明教授攻读古典文献学博士学位期间撰写的学位论文《江西清代进士丛考》。这篇60余万字的学位论文,有近40万字是对清代江西进士的籍贯、姓名、科年、

甲次等信息的勘误与补正。而作者想要通过这些文字表达的,不过是最朴实的一句话:进士群体研究应该重视文献考据工作。这种沉潜踏实的治学态度,在当今的进士研究中显得颇具新意。

关于中国古代进士的选题,主要有3种研究视角。第一种是古籍整理研究的视角,其论著大致又包括两种,一是进士人名辞典,典型代表有房兆楹、杜联喆夫妇合编的《增校清朝历科进士题名碑录·附引得》(1941年)和朱保炯、谢沛霖合编的《明清进士题名碑录索引》(1980年),它们都是主要根据北京国子监进士题名碑的拓片及《国朝历科题名碑录初集》编撰的进士人名索引工具书,也是近20年来学者进行进士量化统计最常用的文献;二是历代进士题名录,代表性著作有南京师范大学江庆柏教授编撰的《清朝进士题名录》(2007年),而浙江大学龚延明教授主持的《中国历代登科总录》则继承了清人徐松的《登科记考》的编纂方法,收录自隋至清1300年间约计110000名进士,总字数约计2200万。第二种是人才学的研究视角,将进士作为隋唐以来的一种重要人才,通过统计不同时空中的进士人数,探讨其与一定时代或区域的政治、经济、教育、文化之间的相互关系。其代表性论著有丁文江的《历史人物与地理的关系》(1923年)、张耀翔的《中国人才产生地》(1926年)、吴培玉的《我国历代人才的地理分布与流向》(1988年)、沈登苗的《明清全国进士与人才的时空分布及其相互关系》(1999年),而1993年出版的《中国东南地区人才问题国际研讨会论文集》则收录了多篇与进士相关的人才学研究论文。第三种是社会史的研究视角,也就是将进士作为一个独特的群体进行考察。早期的代表性论著如潘光旦、费孝通合著的《科举与社会流动》(1947年)、何炳棣的《明清社会史论》(1961年)等,均试图从进士的家庭背景出发,考察科举制度对传统社会阶层垂直流动的影响,近期的相关论著则增加了其他的考察视角,如张杰的《清代科举家族》(2003年)、钱茂伟的《国家、科举与社会》(2004年)、郑若玲的《科举、高考与社会之关系研究》(2007年)、李润强的《清代进士群体与学术文化》(2007年)、多洛肯的《清代浙江进士群体研究》等。本世纪以来,后2种研究视角在学者的论著中也常相互交叉,如陈国生(1994年)、范金民(1997年)、谢宏维(2000年)、李琳琦(2001年)、王耀生(2005年)等关于一省或某一区域进士的相关论文。

晓阳的《清代江西进士丛考》显然融入了以上3种研究视角。首先,作者作为龚延明教授的学生,这篇学位论文本身便是国家社科课题《中国历代登科总录》的成果之一;而文中对《明清进士题名碑录索引》和《增校清朝历科进士题名碑录·附引得》的考订、勘误,则体现了他对这2部目前进士研究界公认的权威工具书的深层思考。其次,文中认为,目前包括地方志在内的各种进士文献都存在或多或少的刊误,因而在进行进士量化统计时,都必须首先进行文献考据。这一观点所指向的,显然是人才学和社会史研究均常会用到的进士人数统计这一基本技术环节。书中对各种进士文献的精心考证,对于当前江西某些地方进士人数的浮夸现象无疑具有去伪存真的现实价值。最后,正如作者所言,这篇学位论文其实只是完成了《清代江西进士研究》的文献基础工作,后期的主要工作应该是《清代江西进士综论》,其基本内容除了进士的时空分布、家族背景、阶层流动外,还包括进士的姓氏分布、仕宦状况、文化创造、社会作为等更多综合的论题。令人稍觉遗憾的是,晓阳在博士毕业后未能集中时间完成这一选题,而是在师从厦门大学刘海峰教授从事博士后研究时将研究方向改为清代科举宾兴研究,并先后承担了2项中国博士后科学基金课题和1项国家社科青年基金课题以及数项省社科、省教育厅课题。目前他完成的《社会公益视野下的清代科举宾兴研究》,书稿篇幅近80万字,已经以“优秀”的成绩顺利通过国家社科项目结题,不日即将付梓刊行。

3年前,我在福州第一次见到晓阳时,曾问他是否愿意抓紧出版这篇学位论文,晓阳则回答文中还有不少值得推敲的地方,想要再多查阅资料,好好修改修改。3年之后,得益于江西师范大学梁洪生教授的极力推荐、江西高校出版社邱建国编辑以学术文化为己任,这篇学位论文终于要与读者见面了,我愿意为之序,并以此与天下朴实治学的青年学子共勉。

福建师范大学教授、全国台联主席 汪毅夫

2013年12月28日

目 录 CONTENTS

001	序
001	绪论 将文献考据引入进士群体社会史研究
007	第一节 四种清代进士名录、索引的编纂及目前利用状况
023	第二节 四种明清进士名录、索引的对校与考订
053	第三节 《光绪江西通志》与清代江西进士
070	第四节 相关方志及其他征引材料的考据
079	第一章 文献考据与清代进士的量化统计
081	第一节 清代文进士总数考订
104	第二节 明清江西进士人数统计与相关考据
129	第二章 四种明清进士名录、索引进士籍贯订误与订补
131	第一节 四种明清进士名录、索引进士籍贯订误
158	第二节 清代江西省内双籍进士籍贯订补
172	第三节 清代江西乡贯外省户籍进士订补
225	第四节 清代江西户籍外省乡贯进士订补
229	第三章 四种明清进士名录、索引进士人名订误与订补
231	第一节 清代江西进士姓名订误
249	第二节 清代江西双名、多名进士订补
292	第三节 清代江西双姓进士订补
295	第四节 《明清进士题名碑录索引》进士人名失载订补

299	第四章 《光绪江西通志·选举表》清代进士考辨
301	第一节 进士籍贯标注问题
311	第二节 进士人名刊误问题
323	第三节 明通进士与钦赐进士
328	第四节 进士中式时间刊误
338	第五节 疑似进士
345	第五章 其他相关文献刊载清代江西进士考辨
347	第一节 《民国江西通志稿·选举志》清代进士考辨
366	第二节 各府、县志清代江西进士摭考
389	第三节 其他相关文献中江西进士杂考
401	附表
441	清代江西进士总表
581	主要征引文献
598	后记

绪论

将文献考据引入进士群体社会史研究

研究历史问题，离不开史料的辨别与取舍。

不管是从哪个角度切入科举学研究，『科举』已成为历史，科举学研究也必须首重科举史料的辨别与取舍。这些史料，既包括《明清历科进士题名碑录》等进士名录，也包括《明清进士题名碑录索引》等进士索引工具书，也包括地方志、朱卷和缙绅录等文献。

自光绪三十一年(1905年)八月科举被废至今,100多年的光阴已然过去。百年中,对科举的历史反思、现实借鉴都已有很多论著进行了详细的探讨。何忠礼先生的《二十世纪的中国科举史研究》^①一文,分“科举制度起源”“隋唐科举制度研究”“宋辽金元科举制度研究”“明清科举制度研究”“对科举制度的历史评价”五大部分,对科举废除后产生的相关研究专著与论文进行了全面的述评。之后,陈高华先生又有《〈二十世纪的中国科举史研究〉的一点补充》^②一文,对何文中未加详细考察的元代科举研究加以补充评述。这两篇文章将20世纪的科举研究状况作了详细的综述,虽然并非巨细无遗,极尽细微,但对于从事科举研究的后继者们来说,确实有非常大的参考价值。进入21世纪以来,科举研究更加蓬勃发展,自2000年至今,仅新发表的学术论文就达400余篇,出版的专著亦层出不穷。

在这种研究形势下,建立“科举学”、为科举制度“平反”的倡议被提出并得

^①历史研究,2000(6):142~155。

^②历史研究,2001(1):187~188。

到越来越多研究者们的响应^①。事实上,回顾百年来的科举研究我们能够发现,建立“科举学”有其事实根据与学科背景。从研究门类来说,科举的研究对象包含了科举制度史研究、科举与古代政治制度、科举与古代教育制度、科举与传统文化、科举与历代文学、科举与传统社会世风民习、科举对朝鲜、越南、日本等东亚各国政治制度的影响、科举与西方文官制度、科举与现代公务员考试制度、科举与当今自学考试及高考制度等诸多领域,其研究方法也日渐突破历史学的范围,转而扩展到政治学、行政学、教育学、社会学及文献学等各学科综合考察的研究思路。可以说,21世纪中,“科举学”确实是一门方兴未艾的新兴学科。

在科举学的各种研究门类中,进士群体社会史之量化统计研究是其中一支新枝。以进士的分省、分地区量化统计为基础,这一研究门类将研究视角从以往的科举制度史考辨、教育学评价、政治学对比、考试学反思等角度转向社会史的中观考察,试图通过观照科举社会的具体参与者和最成功者——进士群体,寻找科举制度下更细微的传统社会的原生态,并进而为当今社会的教育、考试、政治等提供有益的借鉴。

^①这些文章主要有:刘海峰.科举学发凡.厦门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1994(1);刘海峰.“科举学”研究的佳作——宋元强《清朝的状元》评介.社会科学战线,1994(4);谢作栩.“科举学”的新开拓——刘海峰《科举考试的教育视角》评介.厦门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1998(2);刘海峰.“科举学”——21世纪的显学.厦门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1998(4);刘海峰.“科举学”的世纪回顾.厦门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1999(3);刘海峰.“科举学”:一个广阔而专门的研究领域.厦门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1999(4);杨学为.中国需要“科举学”.厦门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1999(4);廖平胜.“科举学”研究与教育价值取向的制导.厦门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1999(4);刘海峰.科举术语与“科举学”的概念体系.厦门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00(4);郑若玲.科举学:考试历史的现实观照.厦门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00(4);田建荣.科举学:理论、体系与方法.广西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00(2);刘海峰.论“科举学”的广博性——以福建科举为例.东南学术,2001(2);刘海峰.“科举学”研究与教育考试改革.山东师大学报·人文社会科学版,2001(4);刘海峰.“科举学”:求解科举研究的最大值.河北师范大学学报·教育科学版,2002(3);张亚群.科举学的文化视角.厦门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02(6);杨李娜.科举学:一门探讨考试发展规律的专学.现代大学教育,2002(3);李均.从专学到学科:“科举学”的应然求索.中国地质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03(3);覃红霞.走向开放的科举学研究——科举学学科与专学之争辨析.厦门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04(3);覃红霞.科举学研究:在学科与专学之间.中国地质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04(3);唐滢.美国的科举学.厦门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04(4)。

遵循着这一思路的指引,本文的最初选题被定为《清代江西进士研究》。选题的初衷,是希望考察清代江西进士在江西省境内的时空分布,分析清代江西士人的科举成绩,对比与讨论清代江西进士的为官经历与文化成就,探寻清代江西进士的生产机制即进士与地方社会的互动关系,研究清代江西进士相互间及其与全国各地进士的文化交流与家族联姻,勾画清末江西进士在历史转型期的众生相以及相应时期内江西人才种类的转变与活动。

然而,研究历史问题,离不开史料的辨别与取舍。不管是从哪个角度切入科举研究,“科举”已成为历史,科举的研究也必须首重科举史料的辨别与取舍。考察清代江西进士亦不外乎此。

有关进士的资料记载可以有4种系统。第一种系统是进士题名录。这个系统记载清代进士有5个阶段,即场内缮写本“进士登科录”、场外刊刻本“进士登科录”^①、国子监“进士题名碑”、民间刊印“进士题名碑录”以及现代出版物《增校清朝进士题名碑录·附引得》和《明清进士题名碑录索引》。第二种系统是私人文集、笔记,其中也包括家族谱牒的相关记载。第三种系统是官书,也就是各种“缙绅全书”,它们有着大量的进士职官履历的记载。第四种系统是方志。作为进士家乡或为官地的地方志,常有较详细的考订,或征引私人文集、笔记乃至家谱的材料。因此在某种意义上,好的方志是可以涵盖第二个系统的。

限于科研条件及个人的学识学力,本文查阅并利用到的文献主要有三类。一是有关清代进士的“进士题名碑录”及其索引,主要有《国朝历科题名碑录初集》《明清历科进士题名碑录》《增校清朝进士题名碑录·附引得》《明清进士题名碑录索引》4种,其中又以以后3种为主;二是专门记载清代江西进士的方志材料,包括《光绪江西通志》《民国江西通志稿》及清代及民国时期修纂的江西各府志、县志中的选举表与人物传记,间亦涉及到外省的清代或民国方志;三是其他涉及清代江西进士的有关材料,包括几种“缙绅全书”“职官录”,顾廷龙的《清代朱卷集成》以及少量文集、笔记等。由于进士在清代是一个相当难以到达的社会身份,因此,据笔者的经验,从私人所撰写的笔记或文集中很难得到相对集中的进士材料。

^①这个阶段中还包括试录、同年录、齿录等各种进士分科题名录。

在查阅与清代江西进士相关的资料的过程中,存在于各类资料中的刊误现象被逐步发现,这些刊误,都会在某种程度上影响本文借用学界的相关研究理论与方法对清代江西进士进行统计与分析的最后结论。为此,本文花费了相当多的时间与精力,对所查阅的相关史料进行了详细的考订,并最终以之作为博士学位论文。从这个意义上说,本文也许只是《清代江西进士研究》的文献考据部分,正文内容也都只是辨析有关文献中收录清代江西进士状况所进行的对校、考订、订误与订补;但从明清进士群体社会史研究这一研究视角来说,本论文的整体性理论反思价值也许能超越预期的设想。笔者在文中试图突破的方面有五点:

一、通过订正学界常用进士名录、索引及方志中的进士籍贯刊误,提醒人们慎用这些文献统计全国以及各省、各地区进士人数。

二、通过订补各种进士名录、索引中的双籍进士,为进士群体的社会史研究拓展进士与古代移民、进士与人才流动的研究思路。

三、通过订补各种进士名录、索引的双名(姓)进士,为相关古代姓名学研究提供众多的例证。

四、通过考订相关方志对清代科举制度的误解,如错误地将明通榜进士、钦赐进士和疑似进士收录到进士表中,提醒人们慎重考辨方志的相关记载。

五、尝试将进士群体的社会史研究所利用的文本扩展到其他文献,如《清代朱卷集成》《大清缙绅全书》《最近官绅履历彙录》等,并同样重视文献考据的功夫。

需要在篇首交代的一个问题是,从历史地理沿革的概念上讲,清代江西和今天的江西在地域上虽然基本一致,但并不完全重合。除了历史地名的变更和行政区划级别的升降,地域范围也出现了变化。这主要是指建国以后婺源县从安徽省划归江西省管辖。本文在行文的过程中,尽量做到尊重历史,如在统计清代江西进士总数时,没有将婺源县的进士人数加进去;同时也兼顾到行政区划的现状,在具体考证的时候,以及文末的进士全表中,也将婺源县进士编入其中,但都注明为“徽州府婺源县人”。

第一节

四种清代进士名录、索引的编纂及目前利用状况

本文所参考与引用的四种有关清代进士的专门资料汇编，都是专门的清代或明清进士名录、索引。其中，《国朝历科题名碑录初集》(以下简称《初集》)和《明清历科进士题名碑录》(以下简称《碑录》)属于以“进士题名碑录”形式出现的专门的明清进士名录，《增校清朝进士题名碑录·附引得》(以下简称《引得》)和《明清进士题名碑录索引》(以下简称《索引》)则属于专门的清朝和明清进士人名索引。

在四种名录、索引中，前两种内容相近，但《初集》为线装书，属于古籍，《碑录》则是古籍的影印版，界乎古籍与现代出版物之间；后两种为今人利用古籍材料重新加以整理编纂而成，属于现代出版物。

一、《国朝历科题名碑录初集》的编纂与目前利用状况

《国朝历科题名碑录初集》是清代刊行的一种专门记载明清历科“进士题名碑录”的进士名录，雍正至光绪年间曾有多种续刻本，本文所利用过的《初集》有两部。一为现藏于福建省图书馆清光绪十六年(1890年)本，为32开本，共14册。前7册为清代历科进士题名碑录，载清顺治三年至光绪十六年各科进士名录；后7册为明代历科进士题名碑录，载明洪武至崇祯各科进士名录。该书保存大体完整，但页内多有虫蛀，虽经该馆修复，仍有一些地方被虫蛀毁。印刷也不算精美，字迹模糊处甚多。一为现藏浙江大学图书馆文理分馆清光绪六年(1880年)本，为32开本，共14册(缺1册)。前7册为明代历科进士题名

碑录,后7册(缺1册)为清代历科进士题名碑录。清代部分自乾隆十七年(1752年)壬申科至乾隆六十年(1795年)乙卯科的进士题名碑录遗缺,在原书中当为合订之一全册,即该书14册中所缺之一册。书中首页有馆藏印章,内容为“浙江师范学院图书馆藏”^①。

两书全称均为《国朝历科题名碑录初集(明洪武至崇祯各科附)》,书中均刊载了4篇序文,一为李周望的“太学进士题名碑录序”,该序文的撰写时间是在康熙五十九年(1720年),时李周望的官职是“詹事府詹事、翰林院侍读学士、仍兼国子监祭酒”;二为孙嘉淦的“续刻题名碑录序”,撰写时间为雍正十年(1732年),时孙家淦的官职为“经筵讲官、刑部左侍郎、办理吏部侍郎事、仍兼管顺天府府尹、国子监祭酒事”。与李周望相同的是,孙家淦撰文时的官职也是国子监祭酒;三为德沛的“进士题名碑录序”,撰写时间为乾隆丙寅年,即乾隆十一年(1746年)。德沛未署自己的官职,仅题“宗室”,然从序文中的“天子以沛尚读儒书,以少宰而兼祭酒,且命教习庶常”一句看,他当时的官职应该是吏部侍郎兼国子监祭酒,这与李周望、孙家淦是一样的;四为钱维城、蒋元益、王际华的“题识”,亦撰写于乾隆十一年。三人的署名方式为“刻是书既成,谨述其颠末如此。乾隆十一年十二月上浣,司事钱维城、蒋元益、王际华全识”,表明他们是当年刻书的具体负责人亦即“司事”。在钱氏等三人的“题识”之前,附有雍正二年(1724年)清世宗的一道“上谕”。

这4篇序文和1道上谕,其排列顺序在两种《初集》中略有不同。在浙江大学图书馆藏清光绪六年本《初集》中,李周望的序文被印在该书的最前面,其他3篇序文与雍正上谕则都被印在明代进士名录之后,清代进士名录之前。而在福建省图书馆藏清光绪十六年本《初集》中,这4篇序文与雍正上谕都是排印在该书的最前面,在它们后面是清代进士名录,而明代进士名录被排印在最后

^①浙江大学最早定名为“国立浙江大学”是在1928年。1952年全国院系调整时,浙江大学文学院、理学院的一部分、之江大学的文理学院和浙江师范专科学校合并,建立浙江师范学院。该《初集》即为当时该校图书馆藏书。1958年该校并入杭州大学。1998年杭州大学合并入新浙江大学。故该《初集》现为浙江大学图书馆文理分馆藏书。在后文的行文中,它也被称为“浙师院残本《初集》”或“《初集》(浙师院残本)”。

面。这能否说明,这两种“初集”是根据不同刻版所刷印的同一书名的书籍呢?

《初集》的作者,浙江大学图书馆藏光绪六年印本未作著录,福建省图书馆藏光绪十六年本的索引卡片上则著录为“(清)钱维城”。据考,钱氏乃乾隆十年(1745年)乙丑科状元,然该书题为“初集”,实始于康熙五十九年李周望。据李氏“太学进士题名碑录序”云:

余夙秉庭训,继迹科目,承乏司成,滥登宫尹,不敢忘策名所自。谨录国朝历科题名碑姓氏为初集。俟次第增益,使多士观感踊跃,咸知我皇教泽深厚,文治邕隆,以垂示无穷。而元明旧碑之在辟雍者并附录之,备考镜焉。^[22](第一册:李周望《太学进士题名碑录序》)

序文中明白解释了该书名为《初集》,乃在于待日后“次第增益”,每开新科,建成新碑,能有新的“进士题名碑录”续刻本出现^①。然而,虽然此后的续刻本确实不断产生,但书名却一直采用《初集》旧名。正因为如此,上海图书馆藏3种《初集》所著录的作者均为“李周望”。

“进士题名碑录”的刊刻,起因于“进士题名碑”的修建。清代“进士题名碑”是专门记载清代历科进士姓名及籍贯的碑刻,它源于唐代进士科的“雁塔题名”,取式于元明建碑于国子监的制度。据《初集》所录清世宗雍正二年十二月初四日下达给国子监的“上谕”云:

国子监进士题名碑,始于唐时新进士榜后于慈恩寺塔下题名立碑。自宋明以至我朝皆建碑于国学,按诸进士甲第先后刻姓名、籍贯于上,所以重科名也。今太学圣庙戟门外所立本朝历科题名碑,自顺治丙戌科至康熙戊戌科止。考《会典》,诸进士释菜后,礼部题请、工部给银一百两交国子监立石题名。康熙三年,辅政大臣裁省此典,其后每科皆诸进士捐资立石。我国家振兴文教,凡乡会试动用帑金数万。朕即位之始,即开恩科。诚以科目一途,实用人取士之本也。题名之典,岂宜遗缺?着工部动用正项钱粮,令国子监将雍正癸卯、甲辰两科题名碑即行建立,康熙辛丑科亦行补建。嗣后每科礼部仍照旧例题

^①李周望在序文中提到“元明旧碑之在辟雍者并附录之”,也就是说还包括了元代的进士题名碑录。但查后人续刻的《初集》,都只有明清两朝的进士题名碑录,而没有元代碑录的内容。